

冷峻审视下不灭的关怀

——谈《左传》“骊姬之乱”的记叙对“骊姬”形象的淡漠

孙益平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0)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574(2022)06-0094-03

骊姬是《左传》中典型的反面女性形象，骊姬对太子申生的陷害让晋国直接陷入动乱。然而结合其它历史著作可以发现，骊姬的手段只是晋国之乱发生的导火索，《左传》几近全然将矛头指向骊姬的记叙是不够全面与准确的。《左传》表面客观无情的记叙背后是对骊姬形象的淡漠，同时淡淡叙述表层之下又蕴含深意，对骊姬个人淡漠其后也不乏对女性群体的关怀。

一、记载取舍下的偏差：通过文献对比阅读看《左传》对骊姬的淡漠处理

《左传》中对“骊姬之乱”一事中的“骊姬”记载篇幅不长，正面描写主要只有如下一段：

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姬谓太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杀其傅杜原款。

此段的主要事件便是骊姬陷害太子。与中大夫谋，结交臣子，可见对此阴谋骊姬早有筹划。引导太子祭祀亡母，再将毒下于太子所献祭酒祭肉，环环相扣，手段狠辣。单从这一段的描写之中，我们很容易便将骊姬单纯定性为有城府有心机的毒妇。同时，《左传》在有关“骊姬之乱”的内容中只记载了献公占卜、骊姬陷害、申生自杀三个主要事件，在这样的记叙之下，献公占卜是对骊姬将乱国的铺垫，骊姬将乱国是一开始便埋下的伏笔。申生自杀前只记载骊姬陷害一事，骊姬陷害便成了申生自杀唯一的甚至根本的原因，骊姬将乱国也得到了印证。然而让我们跳出《左传》中关于“骊姬之乱”的文本，骊姬真的是“骊姬之乱”的罪魁祸首吗？骊姬的狠毒是骊姬天性之恶使然吗？

二、晋献公的挡箭牌——《左传》中的骊姬

《左传》在内容上是对《春秋》的解释，为了更好地分析，我们首先上溯《春秋》。《春秋》中有关此事的记载如下：

僖公（经五·一）五年
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

在《春秋》有关晋国此番动乱的记载之中，骊姬根本没有

出场。虽未提及晋侯杀申生的原因，却也提示了我们申生之死与晋侯杀意是有紧密联系的。

再来看看“春秋三传”其它两传《谷梁传》与《公羊传》对《春秋》这一记载的解释：

僖公（经五·一）五年
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
（传）晋侯斥杀，恶晋侯也。

——《谷梁传》

僖公（经五·一）五年
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

（传）曷为直称晋侯以杀？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
——《公羊传》

这两传都仅对“杀”这一用字进行了解释，一曰“恶”，一曰“甚之”，可见对晋侯批评的态度。若“骊姬之乱”与晋侯全无联系，《春秋》便不至于用“笔法”暗含对晋侯的否定态度，晋侯必然要对此番动乱负有主要责任。而在叙述中将主要责任推于骊姬的《左传》，在这一事件的记载上或许有失偏颇。

从《春秋》的记载以及《谷梁传》《公羊传》的解释中，可以知道将“骊姬之乱”归咎于骊姬一人是不够妥当的，申生之死其根因还是晋侯欲杀。而晋侯与太子申生之间，又存在怎样的矛盾呢？《史记》《国语》中的记载能够为这个问题的解答提供线索。

在《史记》之中，司马迁的记述指出在骊姬陷害太子申生前，献公便早有意废太子，对此有以下几段材料的记载：

十二年，骊姬生奚齐。献公有意废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而蒲边秦，屈边翟，不使诸子居之，我惧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及得骊姬，乃远此三子。

晋献公以加强边防为由派申生、重耳、夷吾戍关，实则疏远三子，削弱势力。在《国语》中，也有关于此事的记载：

献公伐骊戎，克之，灭骊子，获骊姬以归，立以为夫人，生奚齐。其娣生卓子。骊姬请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悬，重耳处蒲城，

夷吾处屈，奚齐处绛，以微无辱之故，公许之。

在《国语》的记载中，点明晋献公派申生、重耳、夷吾戌关乃骊姬挑唆，但我们需要格外注意“公许之”一句。若公言“不许”，或许骊姬在一开始便没了会引发祸端的野心。骊姬再如何任性，也并非决策者，骊姬任性的背后，是晋献公一次又一次的纵容。

十六年，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伐灭霍，灭魏，灭耿。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士蒍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太子不从。

公欲废太子，臣子知。从献公的所作所为中，士蒍察觉出了献公将废太子之意。

十七年，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里克谏献公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率师，专行谋也；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太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稟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率师不威，将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谁立。”里克不对而退，见太子。太子曰：“吾其废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军旅，不共是惧，何故废乎？且子惧不孝，毋惧不得立。修己而不责人，则免於难。”太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里克谢病，不从太子。太子遂伐东山。

公欲废太子，太子知。里克上谏献公太子不得帅师，献公不听，反以“未知其太子谁立”回复，当时申生是名正言顺的太子，而君上却言“未知其太子谁立”，可见献公废太子之心已绝，甚至连太子自己都察觉到自己或将不得立。太子问里克自己是否将要被废，里克虽嘴上说不会，但不从太子的行动却反映出里克认为太子不得立的想法。

献公私谓骊姬曰：“吾欲废太子，以奚齐代之。”骊姬泣曰：“太子之立，诸侯皆已知之，而数将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贱妾之故废适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杀也。”骊姬详誉太子，而阴令人谮恶太子，而欲立其子。

献公私言骊姬欲以奚齐代太子，从骊姬的反应看，骊姬此前虽有野心，但应该未曾当面直接表露心意。是献公欲废太子的想法与对骊姬的纵容让骊姬得寸进尺，最终酿成大乱。

从以上几段《史记》的记载可以看出，献公早有意废太子，并且此意非常明显，诸如士蒍、里克这样的大臣甚至太子自己都已经察觉，申生的太子之位不稳早已是公然之事，骊姬的挑唆与陷害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太子废立是关乎未

来社稷的大事，不是一个跋扈的宠妃便能左右的，也不是君王情感上的偏爱便能任性的。骊姬的手段背后，是献公无声的支持与默许的纵容。

在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下，权力更迭按嫡长子继承制，申生一出身便拥有了继承权，身边必然聚集对于权力趋之若鹜的人。同时太子申生德才兼备、战功赫赫、锋芒毕露。以太子为中心的权力集团的崛起影响到了献公的地位与威望，这才是晋献公废太子的根本原因。骊姬只是在燃得很旺的火里又添了一把柴，多了这一把柴，易坏事，而有柴无火，柴并无丝毫用处。

三、施害者与受害者——历史中的骊姬

《左传》仅仅呈现骊姬陷害申生这一行为结果，刻画出一典型施害者形象，却并无可以解释骊姬行为的相关记载，骊姬作为受害者的形象是被淡化的，读者因此会不自觉给骊姬贴上“乱国祸水”的单一标签。然而，任何看似泯灭道德的恶毒行为都并非一朝产生，畸形的经历才是畸形心理形成的推手。简化骊姬的畸形经历而直接展现其畸形的行为，详细展现骊姬所施恶行而淡化骊姬所受恶行，是《左传》对骊姬形象淡漠的又一表现。

《左传》有关“骊姬之乱”的记载开始便是晋献公欲立骊姬为夫人，是在全知视角对史料进行筛选呈现，那么让我们从《左传》的全知视角中走出，站在骊姬的视角，结合骊姬的畸形经历分析其畸形行为产生的原因。

晋献公五年，晋伐骊戎，得骊姬与骊姬的妹妹少姬，骊姬与少姬事实上就是骊戎为保护自族的“工具”，是晋国获胜的“战利品”。来到晋国后，骊姬又倍受晋献公的宠爱，骊姬儿子奚齐出生后同样备受献公宠爱。

骊姬年少时母国便被灭，并被送给晋国侍奉灭国仇人，骊姬对晋国怎么可能无恨？骊姬同时又得到晋献公的宠爱，人在得到与自己地位不相匹配的恩宠时，便会产生一些或违礼法的野心，当这野心与灭国之恨交织在一起，道德的底线与行为的准则便被冲破了。这些“冲破”的言行举止又不曾得到献公的制止，君上的纵容使骊姬的“冲破”越演越烈，骊姬最终走上设计逼死太子之路。

此番分析并非为了同情骊姬与骊姬共情，因为人在任何境地都依然有选择的余地，冲破了做人的道德底线，便理所应当成为大众批评指责的对象。可在批评之前，总归不能站在上帝的视角进行道德审判，而无视其所历之事与所处时代。

骊姬之“恶”确实直接导致了申生之死、晋国之乱，而骊姬之“恶”却源自于她所经历之“恶”，这些“恶”或痛苦、或甜蜜，却无一不将骊姬推向反水不收的深渊。《左传》展现

骊姬之“恶”，隐去骊姬所受之“恶”，是对骊姬的淡漠，而这淡漠的背后，是作者对骊姬的隐含态度。

四、淡漠处理的背后：记叙者的价值取向与时代的意识形态

一切的写作都是价值取向影响下的结果，无情感、无判断的文字背后也不可避免地蕴含叙述者的倾向性。作者对骊姬淡漠的原因首先是作者个人包括整个时代环境对骊姬其人的审美态度。

从《诗经》许多描写美好女子的诗歌中，我们其实可以窥见春秋战国时期对女性的审美倾向。例如《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蕢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可以看出当时对于贤德女子判定的一些标准，而骊姬杀国君子，直接导致晋国长久动乱，骊姬所作所为完全与“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这些对美好女子的赞美之辞不相贴合，甚至可以是一典型“反面教材”，对骊姬的淡漠是应当且必须的。

其实不止是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任何的历史时期乃至开放包容的现代骊姬都是无法被原谅的，人们需要去否定罪恶与丑陋，这也是为何历代对于骊姬的态度均为淡漠的原因。

然而现代人拥有更多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对骊姬的态度便不该止于淡漠，应该用更加全面与深入的视角审视骊姬其人。现代人早已离开了封建的时代语境，因而能够看到骊姬个人之“恶”背后的封建之“恶”，能够看到封建之“恶”在骊姬划下的伤疤，明白骊姬恶行与这些伤疤是有紧密联系的。而身处封建语境之下的人们大多很难看到骊姬之恶背后的根源，为了批判这种恶，能做到也只有保持对骊姬淡漠的态度这种单一且简单的方式。

同时，对骊姬的淡漠与男权父系社会也存在关联。“在春秋时期的政治生活里，作为一个阶层，《左传》中的女性并不具有独立的政治力量，更多的是作为统治阶级的附庸而存在。但历史环境、政治联姻、自身因素都使她们有可能受到重视，从而与政治、权利发生密切的联系。”在春秋战国的父系社会中，像骊姬一样的女性既可以是统治阶层的圈内人又同时是圈外附庸者，处于圈内还是圈外全仰仗国君的赋予。这样双重的身份与身份的被动转换让其也成为了男性统治者的服务者，她们看似拥有某些权力却在事实上完全丧失了自我主导的权利。其实不单单是《左传》，从“骊姬之乱”其名便可知历史已在无形之中默认骊姬是此番动乱的始作俑者。《国语》中记载了史苏上朝时的这样一番话：“乱必自女戎，三代皆然。”这是把

国乱责任推至女子骊姬。男权父系社会中女性的“被工具化”，生时如此，死后亦然。

五、《左传》对骊姬的淡漠并非《左传》对女性的偏见

《左传》对于骊姬的形象是淡漠的，但这不等同于《左传》存在对女性的偏见，《左传》并没有因为历史上一些阴毒狠辣的女性个体便给女性群体贴上刻板印象的负面标签，相反的，《左传》刻画出很多美好女子的形象。

《左传》所记录的是春秋时的历史，春秋时期，女性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与男性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左传》却并没有因为女性之微而放弃对女性的记叙，依然留有一些篇幅予女性。如负羈之妻：

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肋，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僖负羈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贰焉！”乃馈盘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负羈之妻极富远见，看出重耳之才。“馈盘飧，置璧”对重耳之恩也让晋国攻曹时使僖负羈与其族免于受难。

再如辟司徒之妻：

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锐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与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齐侯以为有礼，既而问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笋。

辟司徒之妻抛掷个人安危于大义大爱之后，一个爱国有孝道的勇敢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

以上只是两个例子，《左传》中优秀的女性形象数不胜数，这些优秀的女性甚至在《左传》的记载中没有姓名，只以某人之妻的称呼出场，《左传》却通过她们的一句话、一件小事捕捉到她们身上的闪光点，并用这些闪光点给她们打上独一无二的烙印。尽管处在男性主导话语权的时代之下，《左传》依然也为女性书写，这是一种伟大的突破与实践。

这些丰富而鲜活的女性形象正流露出了《左传》对女性的客观态度，在对如骊姬的丑恶暗含批判的淡漠之后没有因此带上有色眼镜，而依然对善良与美好不吝赞美，这是对女性群体的尊重与关怀。尽管这种涉及女性的书写存在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但已然难能可贵。